

河北省廊坊市，地处北京东南、天津西北，位于两大直辖市之间。京津冀协同发展12年来，廊坊市已基本融入北京的通勤圈、功能圈和产业协同圈。若是将时间回拨就会发现，廊坊市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，自古不同地域、不同民族的文明于此交汇，造就了其8000年不断的文明之路。本期探宝，我们走出通州，沿着张凤路一路向南，去“邻居”家里做客，感受廊坊市的文化脉动。

### 镇馆之宝：国内罕见“灯幢一体”唐代灯楼

进入博物馆大门，廊坊博物馆镇馆之宝——唐代隆福寺长明灯楼便伫立在大厅。灯楼通高3.4米，整体由汉白玉打造。由下至上，灯楼整体分为壶门形底座、覆莲圆座、等边八角形石柱以及仰莲托盘，共四个部分。廊坊博物馆讲解员韩丽利介绍，在我国现存唐代灯楼样式的文物中，隆福寺长明灯楼从形制、铭文、结构、雕刻技法等方面均十分罕见，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。

“灯楼顶部的仰莲托盘上留有卯眼，据此推测灯楼建成时顶部应有灯饰。虽然文物发现时，顶部的灯饰就已缺失，但也不影响文物的稀有程度。”顺着韩丽利的指引，众人目光定在灯楼钟架的八角形石柱上。石柱共有8面，每一面的最上方均雕刻有两个深浮雕的佛像，最下方则为一个浅浮雕的伎乐，在佛像与伎乐之间则是密密麻麻的铭文，其中就包括灯楼的名字以及制造经过。

石柱正面有一处16字篆书题额，名为“大唐幽州安次县隆福寺长明灯楼之颂”，这正是灯楼名字的由来。从题额下方的颂序中可以看出，制造灯楼的发起人是一名俗家姓艾的僧人，他是在农历四月初八，即浴佛节当天制造一

座灯楼。这一举动引来周边善男信女的响应，大家纷纷众筹。韩丽利说：“颂序的落款显示，灯楼正是农历四月初八建成的。通过颂序我们不仅了解了灯楼建造的过程，也为研究唐朝时期的幽州地理，以及安次县的建制沿革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。”

灯楼共有八个面，雕刻的铭文还包括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《燃灯偈》等佛教经典，捐赠者的姓名以及祭文。记者注意到铭文字体丰富，包括楷书、行书、草书、篆书等，据推测应为不同人书写。“灯柱的作用除了支撑，亦有经幢的功能。这是一件‘灯幢合体’的文物，实属全国少见。”韩丽利说。

距离廊坊博物馆10公里外有一座隆福寺，不少观众认为灯楼是隆福寺的文物，韩丽利却说这背后的真相没那么简单。根据灯楼石柱的颂序记载，唐朝时，如今廊坊市古县境内确有一座隆福寺，但是颂序中却没有提及寺庙的具体位置。“现存文献中鲜有廊坊隆福寺的记载，只有在地方志中存在对灯楼的记载。我们推测古县在唐朝时是有寺庙的，不过跟现在的隆福寺不存在关系。”韩丽利说。

### 远古时期至夏商周：文化交融由此始

河流孕育了人类早期文明。临水而居，择水而憩，自古便是人类亲近自然的本性。8000年前的廊坊，摆放在基本陈列展厅的一个展柜。20余件远古时期的石器、骨器分属四个文明遗址，分别是：洵河流域的孟各庄遗址、刘白塔遗址、永定河流域的北旺遗址、大清河流域的太子务遗址。

韩丽利介绍，廊坊市发现的四处遗址的归属各不相同。孟各庄遗址位于廊坊市三河市，其早期遗存属于兴隆洼文化，距今8000余年；晚期则转为上宅文化，距今约7500—6500年。兴隆洼文化发源于燕山北麓，一路南迁而来。韩丽利说：“上宅文化出土文物的典型纹饰是‘三段式复合纹样’，孟各庄遗址出土的陶片与北京平谷上宅文化所展出的纹饰近乎相似，我们也由此推断出了它的文化归属。”

孟各庄遗址中出土的文物大多为农具，且有房屋遗址。而与其年代相近的北旺遗址（距今约8000年—7000年），则以采集渔猎用具为主，两者形成鲜明对比。孟各庄遗址中出土的石耜（音“四”）是一种常用的翻土农具，形似如今的铲子，使用灵活，适于开垦疏松的沙质土壤。北旺遗址则发现了带坑窝的石器（用于砍砸时垫在下方）、倒靴型支脚（便于在烧火时搁置锅具）等便于携带的工具，且未发现房屋遗迹。“据推测，当时的廊坊市因气候等原因仅作为季节性采集场所。人们在物产丰饶的季节前来，过了季节便离开。”韩丽利说。

同样位于三河市的刘白塔遗址，距今约7300—6800年，与孟各庄遗址距离相近，同处洵河流域。但它属于北福地—镇江营文化系统，源自太行山东麓。至此，我们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一种有趣现象：洵河岸边，孟各庄的人从

燕山北边来，刘白塔的人从太行山东边来，来源不同，文化不同，却能在如此近的距离内同时共存，且时期有所交叠。

太子务遗址坐落于大清河流域，距今约6700—4200年，属于中原地区的后岗一期、二期文化。它是由山东、河南北部一带北上而来。韩丽利感叹：“廊坊虽然地方不大，但四个遗址四个来源，文化都不一样。”这种多元格局的形成，与河流密切相关。在不会挖井的史前时代，人们离不开河流，而不同的河流孕育了不同的文明。洵河流域、大清河流域各自承载着独特的文化脉络。当这些文化在迁徙、交流乃至征战过程中发生碰撞，便产生了融合。廊坊恰好处于几种文化的边缘衍生地带，种种巧合叠加，造就了今天所见的多元文化特征。

从新石器时代进入夏商西周，廊坊依然延续着文化交汇的特质。最早发现于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村的庆功台大坨头文化墓葬，出土了一件喇叭口形制的金臂钏。这是燕山南麓土著文化的代表，为当时土著部落首领或巫师等社会地位较高者所持有。臂钏相当于今天的手环等饰品，在北京平谷刘家河、天津蓟县、河北唐山迁安都出土过同类器物，再往北到内蒙古亦有发现。同一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件靴足黑陶罐，其陶足形似穿上了靴子。目前，这种器物仅在北京新宫遗址和河北发现两件。据推断，靴足陶器应是北坨头文化族群中高等级墓葬的专属器型。

到了战国时期，廊坊南部的大城、文安及固安的一部分地处燕、赵、齐三国边境，其余地区均属燕国。这一时期战乱频繁，七雄并立；诸子蜂起，百家争鸣；社会变革，民族融合。整个社会在征战兼并中逐步走向统一。

### 西汉至唐朝：多民族交流融合之地

与通州一样，廊坊的建置源自西汉时期，不同的是当时的廊坊地域内同时出现了四个县，分别为安次、文安、东平舒和方城。展厅内展示了一些西汉时期的文物，比如一件“千秋万岁”铭文瓦当，这与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中展出的瓦当相似，铭文瓦当的出现印证了当时廊坊地域内应有较大规模的官方建筑。此外，还有一面四神规矩镜，这是汉代常见的铜镜。韩丽利介绍，虽然发现了一些汉代的文物，可以佐证廊坊在汉代时已经建置，但是廊坊市域内尚未发现汉代的遗址，所以也无法确定上述四县县治的具体位置。

自西汉开始，三国、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，廊坊这片土地上发生了民族交往、政权更迭等事件，都在文物上留下了蛛丝马迹。展厅中摆放着北魏时期的太和十一年佛像，这尊造像砂岩材质，头部的肉髻高耸，左手放在胸前，右手置于腿前，从布满周身的衣褶可以看出其身着宽大的僧袍。造像整体清瘦飘逸，极具北魏时期的造像风格。

到了隋唐时期，廊坊大多数时间内归属幽州管辖，属于边界地区。展柜中摆放着两方墓志，出土

于一处夫妻合葬墓，墓志的铭文不仅向后人介绍了墓主人的生平，更为廊坊市大城县的县治沿革提供了资料。“墓中的男主人叫解盛，卒于隋仁寿二年（公元602年）；女主人是解盛的妻子，卒于隋大业六年（公元610年）。他们都是廊坊大城县人，但是在墓志上出现了两种表述。”顺着韩丽利的指引记者发现，解盛墓志上写着“景州平舒人”，妻子墓志上写着“河间平舒人”。韩丽利介绍：“解盛生活在隋文帝杨坚时期，杨坚罢天下诸郡并以州统县，当时的廊坊名为景州；解盛死后6年，隋炀帝推行郡县二级制，改州为郡，廊坊地域改为河间郡。其妻子也在推行郡县二级制后去世，所以墓志上的‘景州’才变为‘河间’。”

而在唐朝，廊坊与周边区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缓冲地带，不同文明在此交流融合。展厅的尽头，一件唐三彩扁壶与20余件唐代陶俑向观众展示着廊坊的盛唐气韵。“这件唐三彩扁壶为模制而成，两侧的纹饰相同。壶身下方为一对高冠曲颈的凤鸟，凤鸟上方是一颗宝珠，再往上则是一只肌体丰腴的蟾蜍，这些纹饰呈现出极富浪漫色彩的盛唐风范。”韩丽利说。

唐三彩扁壶旁边的陶俑则是各民族文明融合的展现。以出土的人物俑为例，墓中不仅有高鼻深目、脸颊丰满胡须的胡人俑，也有圆脸卷发的昆仑奴俑，还有中原人模样的文人俑。不同风格、不同民族的陶俑在一个墓室中出现，再次佐证了唐朝时期的廊坊是胡汉杂糅而居的区域。

根据墓中出土的墓志铭，可知墓主人为董满，生前为恒州冀城县令，不过这个职位并非科举得来，而是朝廷版授。韩丽利介绍，版授是不经朝廷任命，直接授予官职。版授起源于晋朝，兴盛于南北朝，至隋唐时期就演变为对长寿老人的恩宠措施，奖励给民间高寿的老人，不过版授的官职均为虚职并无实权。“董满在唐乾封元年（公元666年）时年满83岁，并在唐咸亨二年（公元671年）去世，满足版授的要求。”

# 京津冀探宝之廊坊瑰宝（上）

本报记者 张群琛 王戩

